

「絕響」

——我與陶然先生

金惠俊

前天才收到《香港文學》第411期「從首爾到南怡島」專輯，因為郵寄的關係常常會遲到些。高興之際立刻開始閱讀「第四屆韓國世界華文文學國際論壇」的與會者觀感。這時我系客座王巨川教授突然來訪，他婉轉說出噩耗。我愣住了，若果再看幾頁那便是陶然先生的〈別了首爾，登上南怡島〉了。

我與陶然先生結緣大約是在二十年前。2002年我在韓國翻譯出版了兩部中國散文選，其中一部就收錄了陶然先生的〈絕響〉。出於此事之由，早就與陶然先生通過幾次信件和電話。幾年後的2004年1月訪港時與陶然先生初次相見，之後幾乎每年都有機會與陶然先生相遇。我去香港的時候總會去拜訪陶然先生，不過我們在各種學術會議上見面的機會更多一些。

2003年9月威海的第十三屆世界華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幾個片斷不由地浮上腦海。

一個是晚餐後在酒店鄰近海邊的小小松林裡與幾位與會者敘談的情景。趙稀方、劉俊、李娜、袁勇麟、許福吉、潘郁琦等幾位年輕的學者作家稱呼本該為叔叔輩分的陶然先生為大哥，還間或開他的玩笑。這個時候他總會若無其事地微微笑着接受，不，好像

他內心裡更願意接受這種待遇。夜越來越深，天越來越黑，結果那天晚上這位大哥終於拗不過這群弟妹的糾纏一起去了鬧區的卡拉OK。

另一個是會後文化考察或文化旅遊去泰山的事情。我們一行人為了觀看日出而留宿在山頂一家有些簡陋的酒店裡。我與陶然先生以及朴宰雨教授三人住在一個房間。閒談中朴教授向陶然先生問起香港文壇的情況。不久後只見朴教授拿來筆記本專心致志地記錄起來，陶然先生也不厭其煩地一一講解。夜已深，四周無聲，在有些昏暗的燈光下，兩個靈魂的周旋不知停歇，聲音一高一低地、語調一熱一冷地。

回首往事，我與陶然先生之交如水較淡。一起用過餐一起飲過茶，卻沒有一起猛烈喝過酒；曾經一起促膝長談，卻未曾經激烈討論。不是我在恭聽陶然先生敘談香港作家與作品，就是陶然先生在傾聽我說明韓國學界與翻譯。但畢竟我們交往的歲月已長，其間共事過很多工作。我參照他推薦而出版了香港年輕女性小說選《尋人啓事》（2006），他勸我寫些文章而刊載在《香港文學》上，我的博士生宋珠蘭也翻譯了陶然先生的作品集《天平》（2014）。她目前正在完成有關也斯與陶然兩位作家作品的博士

論文，預計今年8月即可出版，想來，這不能不說是一件莫大的憾事。

去年5月我去了久違的香港，到達後的第二天就在鰂魚涌見到了陶然先生。陶然先生依然如故。安靜的腳步，安靜的言談，健康狀況似乎也勝過先前。那時陶然先生向我要一篇有關也斯先生的文章，還說到了年底要舉辦劉以鬯先生誕辰一百週年的紀念活動，自己也會為此盡一分力。但是不僅是也斯先生和劉以鬯先生，現在就連陶然先生也離我們而去。我在今年1月出版的《香港文學論——香港想像與方式》（韓文）的自序裡這樣寫道：「感謝許世旭、黃繼持、盧瑋鑾等恩師；感謝以劉以鬯、西西、也斯、陶然為首的眾多香港作家。有些已成故人，有些仍然健在，如果沒有這些人，這本書也不可能存在。」我當時又怎會料到陶然先生也成故人？

早知如此，去年秋季陶然先生來訪首爾時說甚麼也要去見上一面的。我要去首爾見

他的時候，陶然先生卻已別了首爾，登上了南怡島，我也只好就此作罷。就像啟德機場整天轟響的飛機聲音停止一般，自此陶然先生那低沉的聲音也已成絕響。但是就像人們對啟德機場的記憶一般，人們對先生的記憶也不會那麼輕易的消失，隨同對香港一個時代的記憶一起。陶然先生自己早在〈絕響〉中這麼寫：「習以為常的風景不再，往日的一切又立刻變得無比珍貴，在記憶中長存……」

過去我曾經半帶玩笑半帶羨慕之情地說過。陶然先生樂於出席各種會議，我偶爾參加，在我參加的三次會議中就會有兩次遇到您。聽過此話陶然先生微帶羞澀地說，也沒有那麼多了吧？日後我也必然離開此岸，如果真有彼岸，如果在那裡也會舉辦學術會議的話，或許，我會再見陶然先生吧。那麼，再見陶然先生！

2019年3月12日



2014年11月，首屆世界華文文學大會在廣州召開，陶然（左四）與金惠俊（右四）等合影。

金惠俊 畢業於韓國高麗大學，現為韓國釜山大學教授。研究領域主要包括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中國新時期散文，中國現代女性主義文學，香港文學，華人華文文學等方面。著作有《香港文學論——香港想像與方式》（2019）、《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民族形式論爭」》（2000）。譯書有《華語論述，中國文學：多聲現代性》（2017）、《跨世紀風華：當代小說20家》（2014）、《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2005）、《中國當代散文審美建構》（2000）等。論文有《華語語系文學，世界華文文學，華人華文文學》（2017）等。